

# 确立生命尊严的文化

胡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是西方历史的黎明时期，奠定了现代社会上的基础。它表明共同的精神与知识背景，极为重要。二十一世纪，也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真正开始复苏的时机，如果在每一个现代人的内心，铭写“确立生命尊严”六个大字，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

**关键词：**生命；尊严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

## 农村的空洞化与中国的形式化

最近大家见面，免不了义愤填膺。我不相信：“洪洞县里，到底还有没有好人？！”这一古老的质问，竟直指当代的人心，但这黑砖窑的事，分明在朗朗乾坤之间，居然就干了十年！太令人发指了。每天打开报纸，关心着此事的进展，有没有官员引咎辞职？有没有内幕再揭露出来？有没有更多的言论指陈时弊？本想在新消息里，出出气，今也撰一文章，发点议论。相对于兹事之大，舆论再多，也不嫌多。我想到的一点是：确立生命尊严的文化。

因为，事实已经充分表明，绝非逮捕窑主，惩治凶手那样简单。这整个事情，不仅集中了贩卖人口、私狱管理、打手狼狗等罪恶罪行，具备了虐杀、活埋、致残等血腥暴力，而且集中暴露了政治权力的不作为与非法参与，多级权力机构不同程度的冷漠，以及周边村民的熟视无睹，不仅暴露了社会与政治失序，而且表明社会肌体里的一种可怕的“系统化的麻木”，显示了一个人性文明大面积坏死的危机征候。

有人说，提倡生命尊严，你这是诗人之见，这样的事情，绝不是文人学者们发发议论，就能有用的，需要法制。

可是，关于劳动法，早就有了，关于保护劳工的各种条例，也早就有了。正如汪丁丁说得对：“我在搜狐博客读到了韦森的文章，读者可从他的文章读到中国关于儿童权益的各项十分完备的法律，呵呵，具讽刺性的完备性。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及其法律政策，已经写明了多项最美好的权利。问题在于，是什么让它们变得如此苍白？”而且，你再听听河南的警方怎么说：“你们的孩子只是被强制监禁非法用工，没有造成命案，够不上立案条件。再说，按照法律规定，案发地在山西，应该由山西警方去解救。”这就是法律，这就是条文。谁要是真的以为有了法律条文就解决问题，天知道，不是真蠢，就是装傻吧？

又有人说，关键是制度，是执法，而不是观念与文化。是的，执法的力度，是很不够。但是，我们看那里的部门，其实也在不断“执法”。他们甚至也去拆了机器，但是他们走了，黑砖窑又装上新零件，重新开工。红的一方，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黑的一方，心领神会，又开始自己的工作。这也是红黑游戏的潜规则。报载，黑砖窑的各种“公公婆婆”，也多，“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能罚款就去，不能罚款的很少去。罚款了就等于检查完了，至于其他情况，并不是他们检查的重点。”又报载，黑砖窑被广胜寺派出所取缔后，派出所向窑主王兵兵的妻子张梅索要的“办案经费”，“张梅给广胜寺派出所 3.3 万元，但只有 1.1 万元有这样一个简单的收据。”派出所民警当时声称，这笔钱是用来支付被解救民工的工钱、医疗费及返乡旅费等。这里面有一个多么可怕的信息：黑砖窑的黑钱，也可以通过“办案经费”

这样的办法，洗洗白，变成双面合法（警方黑权与窑主黑金）的共谋，这岂不是先颠倒黑白，然后混淆红黑，最后会不会是黑里透红？

所以我说，法律的流于形式主义，跟官样文章流于形式主义一样，是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致命伤。

### 为黑金文化的精神洗钱

之所以会有形式主义，不正是因为实质空洞化了么？实质是什么？除了公权力的腐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从社会心态与社会生活中，真正确立生命尊严的文化。请细读以下报道：

“最多时有十一家部门收取黑砖窑的费用。”而那些基层官员说，“从表面上看，人脏些，头发长些，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就是说，他们检查，关心的不是人，而这个那个“项目”、有没有“立项”的“证件”。（《南方周末》6，21）

当地的村民认为，“怎么管理那些外地工人，那是河南人老衡的事情。”——这就是说，根本没有生命尊严这事儿。

河南少年朱广辉被解救出来后，回家途中，被山西永济县劳动局一监察人员拉下车，重新介绍到另一家黑窑厂做工，并收取朱广辉的三百元打工费。——这就是说，不仅人就是商品，而且敢于对抗不把人当商品的解救行动。

去年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曾播出名为《河南女人贩每年贩卖上千名包身工》。该节目介绍说，“女人贩”周景涣在郑州市城南路有一处租住房，租用了三年，群众说，天天从这里（指郑州火车站）几车几车往外拽人，还只当作劳动力介绍所。常常可见有人从这跑出去，又有人出来追赶，打人、往回拽。这伙人将弄到手的流浪人员或者民工称作“货”，他们弄到“货”后会送到周景涣租赁的房子，他们称作“中转站”，群众暗称为“人肉市场”。

我不禁想到，这事之前，不是有人说，不要追究企业家们的“原罪”，全社会要用宽容的心去对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民营企业么？但是且慢，这里应有区分，一旦有企业家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呢？请看下面的事实：

“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的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这还不算，有的孩子还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后被人救出在医院救了数月也未痊愈），他们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的头破血流，然后随便拿起一快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侍候更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让在窑场自行治愈，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这些孩子身上都因为长期不洗澡长满了牛皮癣似的皮屑，他们最小的只有八岁，八岁的孩子为了一顿饱餐是那么顺从，每天都干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监工或打手巡逻站岗。”（解救儿童家长致社会的一封公开信）

这是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狄更斯笔下的小说场景，还是二十一世纪“大国崛起”时代的中国童奴真相？如果在这样的反人性反人道的罪恶面前，还要宽容，那真是丧尽天良。这样的舆论，不加区分，是为黑金文化的“精神洗钱”，那么，人性人道的尊严，就根本无法重建。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有这样光秃秃的法律学、不道德的经济学、不作为的政治学，才放纵了人道的危机，“人”成为“货”，成为牛马不如。李扬多年前的电影《盲井》里，有个矿主面对死难矿工家属说的名言：“中国啥都缺，就是人不缺。”久而久之，不仅是世道人心的麻木化，而且是“人肉市场”化。所以，才会有黑窑横行十年之久；才会有人大代表致书总

理，也得不到真正解决；以及解救了的孩子回家途中，又被卖掉；也才会有两地警方互相推诿扯皮；至今仍无官员，为此大面积的人道灾难承担责任而辞职；也才会有郑州火车站那样的“人肉市场”的长期存在，多年习以为常。读这样的消息，常常让人犹如恶梦之中，产生一种大难临头、却半步移不得的无奈无力。

## 动身时刻的太阳

所以，我主张连带责任：对破坏良好社会环境的人要严惩，对于社会良好环境被破坏而不作为的人要追究责任，而对于社会精神环境，对于世道人心，每个人都有连带的相关。对于确立生命尊严的文化，匹夫有责。

确立生命尊严的文化，要从观念上逐步改变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绝不容许奴役人、强迫人做他不愿意的事情。确立人性人道高于一切的全民价值观。不管是什么人，是什么机构，都不能以社会发展、进步代价为借口，侵害个人生命的尊严。

要看到黑心文化越来越猖獗、诸如黑心粽子、黑心药、黑心棉、黑心奶粉、假人造蛋白等，已经司空见惯；要重视各种以制假造假来伤害人的生命的犯罪活动背后的罪恶机制，就是信仰流失、民族精神流失的道德危机、人性危机。因而全社会有必要重视保护民族精神的重要符号与信仰体系，再认文化良知。

因而转型时期的社会，应有一个理直气壮的“人文偏好”的社会文化导向，应该大力表彰那些特别强调生命尊严、特别强调以良知反抗麻木的艺术家的作品，譬如古有乐府《孤儿行》《妇病行》《贫妇行》《卖炭翁》，今有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李杨的电影《盲井》、《盲山》。

应该重视当代中国农村的空洞化、价值虚无化。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标如何重建中国农村的价值认同，重建农村的灵魂，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就是要求从政策到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舆论监督到日常生活细节，从商家的广告到娱乐的世界，日渐养成一种全体公民尊重人的风气，确立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尊严。譬如，那些广告语，以金钱为“至尊”、以富人为“高贵”，经营金钱至上的文化，塑造权贵人生、笑贫不笑娼的价值取向，就是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毒化了良性的社会空气。

有一个细节，记者采访当地的村民，除了他们不敢言，他们还只注意到那黑砖窑里干活的人，是“叫花子”。也就是说，“叫花子”，有一份活干，也算是得照顾了。而忘记了恰恰这些人，是最需要关爱、最没有安全保障的人。中国文化，有一个哀鳏寡的文化传统。《尚书·大禹谟》云：“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周公文王，对于天下最无助者的一份关爱之意，可以说是念兹在兹。孔子说“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又说：“四海之内皆兄弟”。理想社会是：“大道之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礼记·大同》）。孟子说：鳏寡孤独，为“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性精神的认同，是中国民族优秀的民族性，值得今天再认传统。其实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人性人道精神。以大史家巴尔赞讲的那个故事为例：

有一次，柯尔律治在伦敦讲授英国的伟大作家这个题目，偶然提到约翰逊博士有一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街边脏水沟里躺着一个又病又醉的女人，约翰逊用宽大的肩膀把她背回自己简陋的住所，给了她食物和过夜的地方。时髦的听众大哗，男人嗤笑、女人愕然。柯尔律治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提醒各位想一想撒马利亚人的寓言。”全场顿时肃静。（引自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第2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为什么大家都会安静下来呢？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一座共同的教堂，有一部共同的《圣经》，有一处共同的精神家园。如果没有这个，就是一个成天充满权力斗争，或为了眼前利

益而牺牲人类生命尊严，一个精神上四分五裂、行为上狼奔豕突的地方。

其实，中国人的人文风教的文化，与西方人的《圣经》与人道主义，正是具有建造精神上的教堂的作用。巴尔赞认为，“它使整个人民有了共同的知识背景和高级意义上的共同文化”。在十六世纪，路德的宗教改革一个很大的成绩，就是使信徒能够直接接受《圣经》的教育熏陶，而不只是成为神父们布道时的被动的听众。这就是所谓“把上帝的话直接带给人民。”而“使《圣经》成为思想和精神食粮，这是最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变化”（同上引）。

要知道，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是西方历史的黎明时期，是他们奠定现代社会基础的时期。动身时刻，共同的精神与知识背景，极为重要。二十一世纪，也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真正开始复苏的时机，如果能在每一家公司企业、每一处政府机构的大门口，在每一个现代人的心，铭写“确立生命尊严”六个大字，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一如我们的动身时刻，共同领受着一轮初日的朝辉。

## Developing the culture of life dignity

Hu xiaoming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sixteen century, the religious reform was the dawn time of western history, and it established the basis of western society. It shows that common spirit and knowledge background are very crucial. In twenty one century, Chinese nation begin to develop, if we take “Developing the culture of life dignity” in our mind, we will not lost ourselves.

**Key words:** Life; dignity

收稿日期: 2008-3-1

作者简介: 胡晓明(1955- ), 男,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